

← (上接2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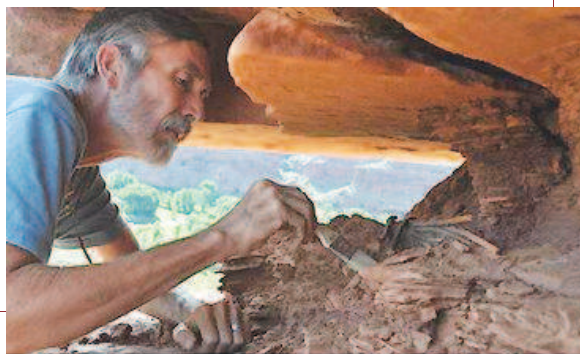
的。其次,人类变革的其中一种方式是增加合作群体的规模,从“对偶制”到一个小的游牧群体,再到农村和一个扩展的亲属群体,最后到一个更大的群体——人们超越了亲属关系而成为一个区域性组织(国家、王国、帝国)的成员。从中我们知道,“第五次开始”要求一个更大范围的合作群体,世界是下一次层次。这个全球统一体有可能由某个单一国家统治,如果这发生了,我认为它并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因为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帝国成功过,它们越努力,失败的可能性则越大(亚历山大大帝、奥斯曼帝国、拿破仑、大英帝国、希特勒——他们最终都失败了)。

**文汇报:**如果说前四次“开始”是被动的过程,人们不断地探索,慢慢进化到更好的文明形态,那么“第五次开始”似乎有很强的紧迫性,人类仿佛面临着开启了倒计时的定时炸弹,一系列人口、环境问题逼迫人们不得不主动寻求对策,应对眼前的危机。您认为,与前四次开始相比,“第五次开始”的特殊性是什么?比起我们的祖先,您认为当下的人类应对危机的能力更强吗?

**罗伯特·凯利:**我在《第五次开始》中所持的立场是一种谨慎的乐观态度。我认为悲观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会导致我们缺乏行动——而我们今天最需要的恰恰就是行动。是的,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定时炸弹,而且“第五次开始”很有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环境灾难、贫困和流行病。但重点是,这些都不是“第五次开始”所必须要



智利阿塔卡玛文化遗址,凯利曾在这里工作。



凯利在考古现场

经历的。简单还是困难模式,道路是我们自己选的,未来十年可能会揭示我们究竟选了哪条路。在应对变化上,我们会比我们的祖先更有能力,因为我们了解人类的历史,而我们的祖先没有。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可以利用过去看看我们的选择究竟会在未来产生什么影响。

**文汇报:**您在书中提到,在未来,“世界政府”、“世界公民”的概念并非天方夜谭。这些往往被看作一种政治上的想象,那么您从考古学的视角能提供怎样的见解?

**罗伯特·凯利:**今天,许多地区正在走向分裂,试图独自走自己的路。英国希望打破欧盟(尽管每个经济学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坏主意)。我认为这是错误的道路——最终这些国家将在必须应付具有侵略性的邻国、由其他国家的选择所导致的环境灾难,或是面临来自饱受战争蹂躏和气候变化带来的干旱所摧毁的国家的移民时,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然后他们将看到合作的智慧。考古学告诉我们,历史的长期模式,特别是自“第四个开始”(国家的起源)以来,充满了错误的选择——奴隶制、帝国、核武器。所幸我们已经学会抛弃其中的大部分。在20世纪,通过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法院等国际组织的建立,我们向实现全球统一迈出了意义深远的一步。这些组织仍在我们身边,但须要得到进一步的培养。

**文汇报:**但是,从最近两年的世界格局来看,反全球化浪潮此起彼伏,比如特朗普,常试图改变原有的国际合作格局,提出各种另立门户的组织,您如何看待这种与上述进化趋势相矛盾的现象?

**罗伯特·凯利:**不幸的是,我认为当前的反全球化、反移民浪潮和反民主情绪不是矛盾的。人口的急剧增长、全球经济体、战争和气候变化创造了一个这样的世界,使得身处其中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相比历史上任何时刻接触得都要频繁。如今,许多人生活在与自己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社区,这让有些人感到不舒服、不确定。他们无法理解,周围的人危险吗?是威胁吗?在今天的美国,这样的状况太常见了。再加上经济不平等和强烈的不安全感,许多人都会退缩和排斥,并指责那些移民。在英国,那些投票支持脱欧的人认为这意味着政府将赶走所有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在美国,投票支持特朗普的人认为他会赶走所有墨西哥人和穆斯林。当然,这些都没有发生,它们不可能发生。至少,在美国,我们有限制其不可能发生的法律体系,我们也已经建立起一种全球公民的文化。

是的,现在看起来很糟糕,但我认为这不会持久。事实上,我们通过说服它们真的会持久来帮助它们尽快结束。但这远远不够,只是一个开始。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想活在一个更和平、繁荣的世界,我们可以在这个简单的事实上构建

全球统一。

## 考古遗址诉说现在和过去之间的联系,对现代城市文化的有益运作至关重要

**文汇报:**上海周边有一些重要的考古遗址,比如广富林、青龙镇等等,国内对考古遗址的一个较为常见的处理方式是建立遗址公园。在您看来,如何更好地向公众展示这些考古发现?能否为我们提供一些可供学习的案例?

**罗伯特·凯利:**我最近一次来到上海是在2015年,我听说广富林遗址公园于2016年开业,青龙镇也仍在挖掘中。不过我去过西安的半坡遗址和秦始皇陵以及北京的周口店等其他地方。中国在向公众展示历史和史前史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不仅仅是秦始皇的兵马俑让我感到惊叹,那些保存它们的建筑本身也让我感到不可思议。

当然,美国也有许多非常好的考古遗址和公园向公众开放,美国考古学家们也花了很多时间思考如何向公众展示史前史。不过我们面临着—项中国没有的难题:所有美国的史前史都是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的历史,但是大多数考古学家和参观这些遗址的公众都不是美洲原住民——他们有欧洲血统或是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准确地向公众展示史前史,而不会对美洲原住民造成无意的冒犯。举个例子,多年来,我们使用术语“Anasazi”来指代那些居住在科罗拉多州南部梅萨维德国家公园的人们,但这一术语冒犯了许多生活在美国的印第安人如霍皮人、祖尼人和杰梅兹人(他们是梅萨维德人的后裔),因为“Anasazi”的意思是“古代敌人”。考古学家们现在使用术语“古普韦布洛人”(ancestral Puebloans)——“Puebloans”指的是那些居住在美国西南部和墨西哥的印第安人村庄(pueblos是它的西班牙语)的原住民。

但所有国家在向公众展示它们的过去时都有这样“危险”的倾向,即把史前史和历史作为一个道德故事,作为一个为现代社会和现存秩序辩护的故事,好像过去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通向现在。这就导致了考古学总是被误解,因为过去并不能预知未来。结果是,现

代政治和社会秩序被证明是关于一个国家的长篇故事的自然结局,阻碍了对现代政治组织的任何批评。我认为,公民应始终监督他们国家的政治组织,以确保政府官员不利用他们的职位谋取私利,并确保政府始终致力于改善一个国家所有公民的生活。这是我在自己国家的一些体会。而考古学家就是通过思考如何让公众和游客在考古遗址中正确地获取历史的经验而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文汇报:**在上海,许多学者试图通过对这些考古发现的研究来追溯上海城市文化的起源问题。在您看来,考古遗址会对当地社区的文化延续性产生什么影响,对构建其文化身份能起到什么作用?

**罗伯特·凯利:**前面我已经提到,过去并不能预知未来,但这并不意味着过去和未来没有联系。当然有!在现代城市和先于它的古代城市之间找到联系,确实会给人们一种归属感和文化的相关性,而归属感对现代城市文化的有益运作至关重要。当我说“有益”的时候,我指的是一个能够为最多的人创造最大利益的城市,一个能照顾最贫穷公民的城市。一个城市的公民就好像一棵树,植根于一个地方,这棵树的福祉取决于这个地方的质量,是否能提供一个整洁、安全的环境,促进所有人的和平与繁荣。而考古遗址能为公民提供这样的地方。在中国尤其是,当人们来到考古遗址前,他们会说“这是我们祖先生活过的地方”。在美国,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有一个积极的城市考古计划,帮助今天的公民看到过去与现在的联系。

策划:

文汇报理评部

执行编辑:

任思蕴 rsy@whb.cn

封面编辑:

陈韶旭 csx@whb.cn

扫一扫微信公众号二维码,关注文匯學人



考古学家终生回望过去,寻找人类足迹。对于准备写作未来的人而言,这显得有些南辕北辙。但是,我希望表明,考古学不仅仅关乎死亡,它也关乎生存;考古学不仅仅关乎过去,它也关乎未来。

——《第五次开始》